

[DOI]10.16164/j.cnki.22-1062/c.2015.01.033

批评性话语分析中的语篇、 话语与意识形态关系探究

刘永兵¹,于元芳²

(1. 东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4;

2. 斯坦林布什大学外语系,南非 斯坦林布什 7602)

[摘要] 在批评性话语分析的讨论中存在理论概念模糊和混同问题,究其原因:脱离批评性话语分析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把“话语”理解为传统语篇分析中的“语篇”,从而忽视了批评话语分析的目的。批评性话语分析与其他语篇分析模式不同,不局限于对语篇的描写和阐释,而是深入剖析制约话语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语境,挖掘被现实话语所掩饰的或人们习以为常的意识形态和权势关系,从而帮助人们重新认识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这种研究对语言教育也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关键词] 语篇;话语;意识形态;批评性分析

[中图分类号] H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6201(2015)01-0182-05

批评性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以下简称CDA)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受到西方有关专家学者的关注,并在学界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语篇分析范式。30年来,经过很多人的努力(如Fairclough, Van Dijk, Wodak),CDA从哲学、文学、社会学、语言学等方面不断博采众家之长,其理论基础日趋巩固,分析模式更为灵活^{[1][2]}。事实上,CDA在国外既是宏观语言学的一个分支,也是一种新的跨学科质化研究方法。作为一种研究方法,CDA被广泛地应用在语言、教育、政治、新闻媒体等研究领域^[3]。

CDA的发展在我国引起了外语学界的重视。很多学者对CDA理论与应用进行了引介和讨论。辛斌^{[1][4]}、戴炜华、高军^[5]详细介绍了CDA的理论渊源、理论框架、基本概念、应用原则等。武建国、谢洪^[6]、辛斌^[4]等讨论了系统功能语法和CDA的关系及其CDA在语言研究中的问题,同时也展望了CDA在我国应用的前景。有些学者

则试图修正CDA,以在其理论上有所创新^[7]。也有些学者采用CDA作为研究方法对新闻语篇等做了实证性的研究^[8-10]。显然,这些研究对我国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是我们发现在CDA的研究讨论中,存在某些理论概念模糊或混同问题。例如,对CDA主要理论概念“语篇、篇章、话语”缺少必要的界定及其关系的讨论(即混同使用);对“意识形态”两种不同的内涵意义混同使用等,其研究缺少了CDA必要的“批评性”(critical),研究目的和结果与DA无异。名不正则言不顺,所以有必要对语篇、篇章、话语、意识形态等的基本概念予以澄清,从而更深入理解CDA的立论和观点,加强CDA作为研究方法在语言教育研究领域中的应用研究。

一、CDA产生的社会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人口和社会经济格

[收稿日期] 2014-11-06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一般项目(12YJA740050)。

[作者简介] 刘永兵(1954—),男,吉林白城人,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于元芳(1957—),女,吉林长春人,南非斯坦林布什大学外语系教授。

局发生了巨大变化。首先,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随着“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fast capitalist),移民和劳动力需求的增加,信息经济的快速发展,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如新移民、有色人种、土著居民、妇女)与强势群体(如资本家、政客、白人、白领)在社会、文化、经济等方面的差异已经不单纯是严重的社会问题,也成为了语言、教育和社会公正问题^{[3][11]}。很多西方学者开始关注少数民族和弱势群体受教育的权利问题,并开始重新审视学校的精英教育传统及其背后的原因。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语言、语篇、话语成为了教育乃至社会和政治的核心问题。显然,语言、语篇和话语与知识、经济文化、符号、物质资源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一个人的语言文化资本往往决定一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而社会地位往往决定话语权力的大小^[12]。

其次,西方工业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导致了全球经济结构、工作和消费文化等的急剧变革。20世纪80年代以来,信息型工作与传统工作并存,技术多元化与技术缺乏同在,生产多样性与文化单一性共存,工作的灵活性与刻板方式共生^[11]。在这个时代里,语篇与符号已成为人们的主要交流媒介,传统的面对面和书面语言交流受到了新型电子媒介语言的挑战,新型电子媒介语言交流已成为全球政治、经济、商务交流的主要手段之一。换言之,21世纪的公民,无论做什么工作,都必须具有语篇和符号编码、解码和批评的能力,即人们工作、消费和休闲及其质量都取决于他们构建、控制和管理语篇和符号的能力。因此学者关注语篇和文化能力的研究就不言而喻了,甚至语篇和符号也成为了国家和国际政治研究的一个新的焦点。

另外,在任何社会生活中,人们都自觉不自觉地在追逐利益的最大化,而利益具有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烙印,而且利益赖以存在、传播和巩固的媒介则是语篇^[3]。主流语篇研究主要是语言使用与语境的关系、语篇结构、语篇意义、语篇技巧、语篇意向/目的等^[13-14],而不解释语篇构建与权势、社会和主体地位之间的关系。要解释这些关系,需要一种既能分析语篇形式特点,又能解释语篇意义表达的利益关系和权势关系的研究方法。基于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uralist)、新马克思主义(neo-marxist)、女权主义和批评语言学理论,CDA应运而生^{[2][5]}。

二、篇章、语篇、话语

不同于系统功能语言研究、社会语言学研究或其他语篇分析模式,CDA旨在通过语篇分析挖掘语言的社会功能、语言使用与利益关系、权势关系等。因此它是批评性社会研究(critical social research)的一种形式。各种社会活动都离不开作为媒介的语言和符号,因为没有语言和符号,社会活动就无法正常进行。语言和符号也是社会的一个构成因素,它的形成、应用与发展受其他社会因素的制约,并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社会发展的特点。因此,要彻底弄清各种错综复杂社会现象的本质(如不平等、不公平、贫富差距等),必须借助语言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通过对语篇的分析,挖掘隐藏在语篇和话语内部的社会根源。

CDA的出现使运用语言学研究手段进行社会科学研究成为可能。CDA较之于其他语篇分析方法,具有很强的政治色彩;因为它不只局限于对话篇的描写和解释,而是深入剖析制约话语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语境,挖掘被现实话语所掩饰的或人们习以为常的意识形态和权势关系,从而帮助人们重新认识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以便寻求建立更平等、公正、和谐的社会。

因为它是批评性社会研究(critical social research)的一种形式,具有很强的政治目的,所以CDA中“Discourse”(话语)与其他语篇分析模式中“discourse”(语篇)意义不同,在汉语的表述中不能混为一谈。我们必须承认二者不易严格区分,所以国内语言学界有三种译法,即“话语”、“语篇”、“篇章”,而且混同使用。对于三个术语的使用,学界主要有两种看法:一种看法认为“话语”、“语篇”、“篇章”互用,但“语篇”是总概念,“话语”与“篇章”则是属概念。胡壮麟在其所著的《语篇的衔接与连贯》中将text称为“篇章”,discourse称为“话语”,进而指出本书中所谈的语篇是广义的,既包括“话语”(discourse),也包括“篇章”(text)。“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通俗上口,但易产生误解;‘篇章语言学(text linguistics)’内涵更广,但过于正式”,因而他采用折中的办法,将二者合而为一统称为“语篇”^[15]。另一种看法是“话语”、“语篇”与“篇章”的说法可以互用,但当研究语料范围为口语时倾向于使用“话语”;研究语料范围为书面语时倾向于使用“篇章”。王宗炎在其主编的《英汉应用语言学词

典》把 text 定义为“篇章、语篇”；把 discourse 定义为“语段、语篇、话语”。王宗炎的定义并未确切区分 text 和 discourse 的译名，但二者译名的通用部分是“语篇”^[16]。本文同意胡壮麟的看法，在语言学本领域研究中，“语篇是总概念，话语与篇章则是属概念”^[14]，本文认为这里“话语”强调的是“语篇加工过程和意义”，而“篇章”强调的是“语篇形式”。

然而，这种看法在 CDA 研究中则行不通，因为 CDA 对“discourse”的定义与其他语篇分析模式截然不同。如 Fairclough 把“discourse”定义为“建构知识的某种方式”^[17]；Foucault 认为“discourse”“构成客体、主体及其关系”^[18]。而 CDA 主要研究“社会权力、社会权力滥用、社会控制与不平等是如何在社会和政治语境下通过口笔语语篇实现的、如何产生的、抑或是如何受到抵制的？”^{[3][19][20]} 根据这些定义，显而易见，discourse 不指具体的语言形式，也不指单纯的语篇意义，而指通过具体语篇形式和语篇意义进行的知识、客体、主体及其关系建构和交流的方式。这种建构和方式必然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认知方式等因素的影响，所以 discourse 包括与这种方式相伴而生的身份、权势、价值、意识形态等意义。所以使用“话语”比较合适，即 Gee 称之为大写的 Discourse，而“语篇”则指具体语篇形式 (text) 和意义 (discourse)，即 Gee 称之为小写的 discourse^[21]。由此可见，“话语”不是通过一个语篇形式和意义，而是通过多个互文性 (intertextual) “语篇”来实现的。正因为如此，CDA 涉及三层面的分析，即篇章、话语实践 (discourse practice) 和社会文化实践 (sociocultural practice)^[22]。在篇章和社会文化实践之间起媒介作用的是话语实践。具体而言，CDA 首先要对具体篇章进行语言描写分析 (如体裁结构，词汇、语法选择等结构特征、策略)，然后解读该篇章语义加工和推理过程及其与其他篇章之间的关系 (互文性语篇形式和意义)，最后结合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认知方式等制约因素解释其加工推理过程与社会过程之间的关系^[17]。

另外 CDA 将 discourse 视作“社会文化实践”，而社会文化实践实际上是一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及一系列潜在的可能性。然而，这些抽象的东西经过一系列的实际应用便会变成具体的客观存在，如工厂、公司等经济实体，或书面或口头篇章。从具体篇章到话语的转变过程由于

受社会因素的限制往往是非常复杂的^[17]。例如“篇章”(text)在现代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从给孩子讲故事到做政治演讲、从电视上的脱口秀到日常生活中的一般对话、从课堂授课到会议发言等等。所以说，我们的日常生活时时刻刻都在产生篇章。篇章是“使用中的语言”(language in use)，即任何连贯的、能传达意义的笔头及口头语言^[23]。但是无论实际生活中产生多少篇章，他们总会在措辞、结构和意义上出现重叠或交叉。这些具有相同构成及表达特征的篇章就归属于同一种语篇形式或体裁 (discourse types, genres)，而话语是能生产语篇形式的一系列抽象、概括性原则标准。这些原则标准是人们作为特殊文化成员的知识 and 行为的一部分，因此它不仅是人们意义交流的载体，而且也成为交际过程中社会各主体 (subject) 之间社会关系的表现。CDA 便通过语篇分析揭示隐含在篇章发出者与接受者之间主动与被动、控制与受控制的关系。

三、话语、意识形态和霸权

还有一对理论概念，意识形态和霸权 (ideology 和 hegemony) 需要澄清。英语中 ideology 具有两种不同的含义^[24]。在一般文化研究或讨论中，ideology (意识形态) 是个中性词，一般意为某群体、某亚文化、某政治团体的思想、信仰、价值体系 (如新闻媒体和一般文化研究常用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嬉皮士的意识形态”等)；而在批评性社会研究 (critical social research) 中则指“对社会、经济、政治现实及其关系的曲解表达或陈述”^[24]。CDA 认为在当代等级森严的社会中，语言、符号、物质资源等的产出和分配是不平等的，这种不平等与社会权势关系 (power relation) 不平等相符相承，而主导社会的话语往往是隐藏或使这种不平等关系自然化的手段^[24]。换言之，当代社会主导话语一般把这种不平等或权势关系表达为“历史、社会和文化的必然产物”，如性别差异、劳动差异、学习差异、贫富差异，甚至把这些差异视为“纯生理的、心理的、智力的产物”^[24]。这就是意识形态，即对社会、经济、政治现实及其关系的曲解。

例如，日常生活中的语篇并不是随意出现的，而是由特定社会群体的利益决定的。不同的社会群体为实现不同的社会目标而使用不同语篇形式和意义 (如政治、新闻、学术等语篇)。话语的作用之一是通过在日常语篇形式中反复出

现的语篇意义,把某个社会群体的文化知识、价值观或意义逐渐变成成为大多数人的“常识”(commonsense)或视为“自然存在”(即意识形态)。正如哈贝马斯概括的那样,语言是主导社会力量的媒介体,语言能使权力合法化,这种合法化了的权力关系即构成了意识形态^[20]。

Fairclough 将这种意识形态话语的作用解释为“霸权”(hegemony)^[25]。在他看来,日常语篇中蕴含的话语总是代表了特定社会群体的利益,一旦这种话语高度普及并成为普通常识,而且为该社会群体服务的功能又被人们不加怀疑地接受,便产生了霸权,而这种霸权必将影响语篇发出和接受者对社会、权势等的认知和判断。因此霸权便不可避免地与社会认知相联系,即二者具有辩证关系。霸权涉及知识、信仰、理解、态度和价值观等,而且在某种意义上,霸权话语构成了社会群体的公共思维习惯,即形成了社会认知共识^[26]。我们知道社会共同的认知体系是对社会组织、思维、推理和学习等心理操作共享的系统^[7]。该系统是任何篇章、话语实践和社会文化实践及其之间关系的前提条件。因此要想解释话语是如何建构意识形态并发挥霸权作用的,就必须把语篇结构、话语意义、意识形态等与话语社会认知系统联系起来,把社会结构和社会认知联系起来。CDA 的任务就是解读某社会共同的认知体系,批判建构意识形态并发挥霸权作用的话语,即揭示和批判那些人们习以为常的意识形态和霸权话语。

四、CDA 与语言教育研究

如前所述,CDA 理论和方法与其他语篇分析模式不同,因为它不只局限于对语篇的描写和解释,而是深入剖析制约话语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语境,挖掘被现实话语所掩饰的或人们习以为常的意识形态和权势关系,从而帮助人们重新认识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以便寻求建立更平等、公正、和谐的社会。这对语言教育研究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根据 CDA,任何“学习”(learning)都不单纯是个体大脑活动,而是一种社会文化实践活动,而这种社会文化实践活动受话语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语境的制约,那么在学习过程中就不可避免地存在某种学习者习以为常的意识形态和权势关系(如不平等师生关系、权威知识与有用知识关系)。另外学习者所学知识是以各种语篇形

式和意义传播的,而语篇形式和意义又是通过教育机构性话语(如蕴含于政策、大纲、教学、管理的话语等)构建的。所有这些社会文化实践都是受所处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价值、利益体系控制的,而这些政治、经济等体系渗透着权势、霸权等因素。所以 CDA 在外语教育研究中,有助于研究和分析外语教育的核心问题,即应该教或学“什么”(what)?“如何”(how)教和学?同时也有助于探讨“为什么”(why)教和学某些知识与技能(如强调听说还是读写?人文性还是工具性?),而不学另外的知识技能?

具体而言,CDA 不仅可以分析不同外语语篇类型的形式和意义,还可以分析这些不同的语篇(类型)是如何形成的,从而发现为什么存在不同类型的语言运用,人们为什么使用不同的话语策略,为什么会存在不同的会话顺序和话轮等,从而揭示蕴含其中的人们习以为常的意识形态和权势关系。这种分析有助于教师和学生了解各种语篇(discourse types)的结构模式、词汇语法选择规律及其社会影响因素和其中蕴含的权势关系,从而提高基本的语篇编码、解码能力和语篇理解和产出能力,争取更大的话语声音或话语权。

CDA 认为权势关系与意识形态是不透明的(opaque),话语是掩饰权势关系或权势关系自然化的手段和方式。这些权势关系是以符号物质系统为媒介的社会生产和分配不平等的根源。所以借助 CDA,有助于重新审视习以为常的语言教育现象,批评性地分析语篇所表达的利益和权势关系,从而揭示社会权力和社会权力滥用及不平等现象是如何在特定社会和政治背景下通过口笔语语篇得以产生、实施、完成或遭到抵制^[26]。这种分析有助于教师和学生学会从不同视角看问题,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中看到规律性,从而提高其质疑权威知识的能力,而质疑权威知识能力是创新能力发展的前提。

CDA 是对权势关系、利益关系等的批评性研究,即通过分析、发现并解释话语和社会文化形成过程之间隐藏的不平等、不公正、等级关系、歧视等现象,从而打破这种权势关系,以维护自己的主体地位和权利。这种分析可以培养教师和学生的批评意识和能力,从而提高其语篇和话语创新能力。

CDA 虽然还不是非常完善成熟的分析方法,但它对语篇中隐藏的权势关系、意识形态、文化

等因素的敏感性和解释作用是值得我们广泛应用和深入探讨的。尤其在教育全球化的今天,我国社会、文化、教育不平等现象日趋凸现,教育正经历着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变。这都呼唤批判与创新精神的培养,所以 CDA 在语言教育研究领域会发挥愈来愈多的优势。

[参考文献]

[1] 辛斌. 批评性语篇分析方法论[J]. 外国语, 2002(6): 34-41.

[2] 辛斌. 批评性语篇分析: 问题与讨论[J]. 外国语, 2004(5): 64-69.

[3] Luke A. Beyond Science and Ideological Critique: Developments in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J]. Annual Review of Applied Linguistics, 2002(22): 96-110.

[4] 辛斌. 批评话语分析: 批评与反思[J]. 外语学刊, 2008(6): 63-70.

[5] 戴炜华, 高军. 批评语篇分析: 理论评述和实例分析[J]. 外国语, 2002(6): 42-48.

[6] 武建国, 谢洪. 批判性话语分析的新成果: Fairclough “话语分析”评介[J]. 现代外语, 2004(4): 432-435.

[7] 张辉. 试论认知语言学与批评话语分析的融合[J]. 外语学刊, 2008(5): 12-19.

[8] 黄勤. 批评性话语分析视角下的新闻翻译分析——以转述话语的翻译为例[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8(3): 55-59.

[9] 唐丽萍. 对英语学习者文化霸权话语解读的批评话语分析[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9(4): 47-51.

[10] 曾亚平. 从批评性话语分析角度解读奥巴马的总统选举获胜演讲[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9(2): 19-21.

[11] Luke A. Text and Discourse in Education: An Introduction to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J]. Review of Research in Education, 1995(21): 3-48.

[12] 刘永兵, 赵杰. 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外语学习理论建构的社会学视角[J]. 外语学刊, 2011(4): 121-125.

[13] 徐超. 话语分析二十年[J]. 外语教学与研究, 1995(1): 14-20.

[14] 朱永生. 话语分析五十年: 回顾与展望[J]. 外国语, 2003(3): 43-50.

[15] 胡壮麟. 语篇的衔接与连贯[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4: 1-3.

[16] 王宗炎. 英汉应用语言学词典[Z].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8: 107, 389.

[17] Fairclough N. Analyzing Discourse: Text analysis for social research [M].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127-128.

[18] Foucault M.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A. Sheridan-Smith, Trans.) [M].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2: 131.

[19] Van Dijk T. A. (Ed.). Discourse as Social Action[C]. Vol. 2. London: Sage, 1997: 1-7.

[20] Wodak R. Disorders of Discourse [M]. London: Longman, 1996: 41-68.

[21] Gee J. P. An Introduction to Discourse Analysis: Theory and Methods[M].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201-202.

[22] Fairclough N.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he critical study of language [M]. London: Longman, 1995: 124-127.

[23] Halliday M. A. K. & R. Hasan. Language, Context and Text: Aspects of Language in a Social-semiotic Perspective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126.

[24] Luke A. Ideology. In J. L. Mey (Ed.), The Concise Encyclopedia of Pragmatics[C]. Amsterdam: Elsevier Science, 1998: 366-368.

[25] Fairclough N. Intertextuality in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J]. Linguistics and Education, 1992(4): 269-293.

[26] Van Dijk T. A. Principle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J]. Discourse and Society, 1993(4): 249-283.

An Explor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xt, Discourse and Ideology in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LIU Yong-bing¹, YU Yuan-fang²

(1.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Changchun 130024, China;

2.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Stanley Bush University, South Africa 7602)

Abstract: Recently CDA has aroused the interest of Chinese scholars who have discussed CDA both as a theory and research method, and have done some empirical studies on newspaper reports. While welcoming the new approach to discourse analysis in the Chinese context, we find that in these studies there is some misunderstanding of the basic theoretical concepts of CDA such as text, discourse, ideology and critical analysis. Therefore, in this paper, we first point out some problems in the CDA research in China, and describe the sociocultural context where CDA was initiated with the focus on its research purpose. After that, we discuss the basic concepts of CDA and their relations in order to show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DA and DA in terms of definitions, research purpose and significance. Finally, implications and suggestions are made to do CDA in the language education context.

Key words: Text; Discourse; Ideology; Critical Analysis

[责任编辑: 张树武]